

古籍裡的風景—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印記初探

The Scenery in the Rare Books—Collector's Seal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張圍東 **Chang Wei-tung**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

Director, Materials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wdc@ncl.edu.tw

【摘要 Abstract】

我國古代的許多藏書家，都懷有自己的理想及抱負。他們對於經眼閱讀或收藏的善本典籍，都留下印記引以證的習慣，這也構成中國古代典籍常見有藏書印記的一大特色。他們不但延續了歷史的生命，也對知識文化的推展，作了偉大的貢獻。藏書印的種類、形制與風格包羅萬象，並無一定的準則，完全依藏書家個人的喜惡與品味而定。隨著紙本與雕版印刷的興起，藏書印記由唐代偶有所見，至明清之際蔚為風氣，廣受藏書家的喜愛。這些藏書章不止在於美觀，可供觀賞而已；而是這些小小的藏書章裏蘊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本文以國家圖書館典藏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記為主要探討的對象，並藉由藏書印記來說明藏書家對書籍的保護，以及藏書家愛書的心境，希望藉助本文能找回讀書、愛書、藏書的原意，進而建立溢滿書香的社會。

The collector's seal was commonly found in many Chinese rare books. Seal wa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re books and helped the spreading of book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 types and styles of seal are varied and have no specific rules of designing. The collector's seal was found in Tang dynasty and widely foun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hich attracted book collectors' attention. The seal was not only for appreciation and also told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history, and design of the books seal found in the rare book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study could make contribution in

building a book loving society.

【關鍵詞 Keywords】

鈐印、藏書印記、藏書章、善本古籍、藏書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are Books; Collector's Seal; Book Collector; Seal

一、緒論

藏書印又稱藏書章，從廣義上來說，是出於不同目的，鈐蓋在文獻上的各種標記。從受印者來說，包括圖書、書法及繪畫作品、信件、公文等紙質文獻資料；從施印者來說，包括文獻的收藏者、觀賞者及校勘題跋等整理者。從狹義上來說，藏書印是藏書人用以表明圖書所有權和表達其個性情趣的一種印章（吳芹芳、謝泉，2005）。

從古至今，有數萬藏書家在保存文化、傳承文明方面做出了貢獻。先秦兩漢之際，出現了「圖書館」，當時稱之為「藏史」、「柱下史」等，著名哲學家老子曾出任過「柱下史」。戰國時的惠施因藏書較多，史書上稱之為「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周，1605)。秦漢之時，著名的藏書家伏勝為了躲避秦始皇焚書之厄，乃將《尚書》等典籍藏於舊宅牆壁之中，漢定，再求其書，已損失數十篇（梁戰、郭群一，1991）。紙張和印刷術發明後，書籍不再是奢侈品，而逐步走向了民間。唐宋元明清各朝，藏書家更是層出不窮、代不乏人。

古代的藏書家，都懷有了不起的理想及抱負。他們對於經眼閱讀或收藏的善本典籍，有留下印記引以證的習慣，這也構成中國古代典籍常見有藏書印記的一大特色。他們不但延續了歷史的生命，也對知識文化的推展，作了偉大的貢獻。他們多為貴族、官員、學者等具有社會地位之人，他們對典籍有一定的修養和鑒賞。透過不懈的收藏，努力搜求版本品質高、流傳年代久的精善之本，或稀世罕見的孤本，並且對藏書精於校勘、考證、辨偽，以至於諸多藏書家精通目錄、版本、校讎之學，且對某些學科領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我國的刻印術，大約起源於商周，不過，將它鈐在字畫或書籍上，大約是在唐代。印記的主要用途，是做為徵信或識別；用它鈐在字畫和書籍上，最初也是為了識別收藏品。所以鈐在古書上的圖章，最常見的是寫「某某人珍藏」或「某某齋秘藏」等字

樣。前者寫的是收藏家的姓名或字號，後者寫的是收藏家的書齋。

書齋，有時候稱做軒，或叫做閣、樓、居、山房、堂、廬、室、館、精舍、庵、園、屋、廬等，所以我們要刻藏書章，應該先為書房取個名。前人為書齋取名，饒有深意。如清代的大史學家徐乾學，他在屋後蓋了一棟大藏書樓，共有七楹，貯書數萬卷，將藏書樓取名「傳是樓」。又如周春，也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家，他曾經得到一部宋刻的禮書，接著又得到一部宋刊的陶詩，兩書並存一室，所以書齋取名為「禮陶室」；後來禮書賣了，遂將室名改為「寶陶室」；接著陶詩又售去，於是悵然的將室名改為「夢陶齋」（劉兆祐，1983）。到了後來，珍藏書章的目的，不在於識別收藏而已，每將自己得書的經過，或告誡子孫的話，也藉著藏書章的銘文表達。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歷時85年藏書，承續千年累積的文化遺產，並以保管歷代珍貴圖書文獻為其主要職責之一，館藏善本古籍相當豐富，尤具特色，深獲國內外學術界重視。1940至1941年間，對淪陷區善本書的多方洽購（封思毅，1989-1992）。江南民間藏書流散，在「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成員積極奔走之下，陸續蒐購江南著名藏書家典藏之籍，歸納可知書主及數量為：

1. 吳興張氏適園（張鈞衡）：善本1,200餘種、精品約600餘種，黃跋書160餘種。
2. 劉氏嘉業堂（劉承幹）：宋元本30餘種、明刊本1,200餘種，鈔校本30餘種，稿本400餘種。史、集二部多佳本。出自天一閣、抱經樓舊藏不少。
3. 江寧鄧氏羣碧樓（鄧邦述）：善本約310種，以抄校本有名於時（大多為寒瘦目所著錄），又有汲古閣所刊書16種。
4. 順德鄧氏風雨樓（鄧秋枚）：藏書750種，明刊善本及抄校本近200種，叢書110餘種。鄧氏以流佈民族文獻見長，其重點在清初諸家著作，多為罕見。
5.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瞿紹基）：元明刊本及抄校本60餘種。
6. 費氏念慈：善本200餘種，宋元明精刻本近100種，抄校本在100種以上。抄本皆佳，每足補正四庫本。清儒中，乾嘉諸大師之著作，已得其所藏的十分之三、四。
7. 劉晦之遠碧樓：所藏宋刊等，全部在此。
8. 嘉興沈氏海日樓：藏書80種，天一閣舊藏不少，多佳品（封思毅，1989-1992）。
9. 聊城楊氏海源閣（楊以增）：宋元本及抄校本百餘種（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2014）。

此外，尚有吳縣潘氏滂喜齋（潘祖蔭）、江安傅氏雙鑑樓（傅增湘）等，這些善本大多鈐蓋「希古右文」、「不薄今人愛古人」朱文牙章，以避免引人注意。在1940至1941年間蒐羅古籍善本，計有4,864種48,000冊。後又接收陳群「澤存書庫¹」的藏書。遷臺後，先後購得張溥泉遺書，又受贈於王氏觀復齋與湘潭袁氏玄冰室二家藏書，自此奠定在國際古籍典藏與漢學研究之地位。



圖1 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所鈐印藏書家的藏書印記

這批身價不凡的善本古籍，除了具有史料價值外，如單從版本特色、藝術鑒賞的角度觀察，也有可取之處。這批涵括宋元明刊本、寫本、抄本在內的古籍，從版式到行款、從文字到圖像、從字體到墨色、從鈐印到題款、從紙張到裝幀，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時空，折射出當時的歷史。舉例言之，國圖所蒐藏這批善本，有紙白如玉，墨若點漆的宋刊本；有字體嫵媚，雕鏤精麗的元刊本；有古樸可愛，史集稱雄的明刊本。還有經乾隆禁燬和洪楊之亂，成了流傳絕罕的古籍，而萬曆、天啟、崇禎、清初以及嘉慶、道光等刊本，除了具有明清初史料價值外，更可以表現出卓越的藝術特色。

¹陳群（1890-1945）為汪偽組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兩地各建造書庫，蘇州亦有一些藏書。大部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來不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照收。所接收藏書中，如趙烈文於清咸豐8年（1858）至光緒15年（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建安王朋甫刊本《尚書》等，都相當珍貴。又如清楊德亨《尚志居集》，具備了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底稿本及清光緒九年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從表層來看，國圖收藏的是文獻，但如從深層來看，國圖收藏的其實是文明的歷史與記憶，其豐富內容已廣為海內外學術研究者所引用與重視，咸認為是研究中華古文化的重要資產。

本文以國圖典藏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記為主要探討的對象，並藉由藏書印記來說明藏書家對書籍的保護，以及藏書家愛書的心境，希望藉助本文能找回讀書、愛書、藏書的原意，進而建立溢滿書香的社會。

二、藏書印的類型及其作用

鈐印，中國古代官方檔或書畫、書籍上面的印章符號，是書籍在流傳過程中由藏書者鈐蓋的印記、印章，用以表明書籍的所有權及表達收藏者個性情趣的一種印記。清末著名學者、藏書家葉德輝在《藏書十約·印記》中是這樣描述藏書鈐印的：「藏書必有印記」（葉德輝，1978）。因此，藏書印記是研究我國歷史文獻發展變化的重要依據。流傳至今的古籍，卷首大多鈐有累累藏書印，古雅別致，朱墨燦然，亦是開卷依樂。明清兩代，一些較知名的藏書家幾乎都有幾方乃至上百方藏書印，每得好書，把玩珍賞之際，必鈐印其上，其後是書流轉遞傳，乃至朱痕累累。

國圖自1933年在南京成立籌備處開始，不斷蒐集古本舊槧，善本古籍達12,922種135,478冊。歷來遞經公私儲藏，書葉之內收藏印章，不乏名家之作，舉凡真賞、精鑒、校勘、審定、借觀、讀過、經眼、書尾，以至傳誠、述志、寄情、題跋，莫不印以誌之。其印文則鐘鼎篆籀紛陳，其色則丹黃朱藍相參，其形則方圓長闊與葫蘆連珠並見，硃痕滿紙，動人心目。它不僅藉可考鏡圖書授受之源流，亦足供金石方家之俊賞。依據楊果霖指出「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鈐印大約五萬四千方印文」（楊果霖，2017），實際上，國圖在1988年編印出版《善本藏書印章選粹》一書，也沒有針對藏書印做過統計，尚待查證。目前國圖正在整理善本古籍裡的藏書印，俟整理完成後就有比較正確的數量。

依據國圖鈐印在善本古籍中的藏書印來說，其藏書用印，形制不一，風格各異，就藏書印文內容而言，可歸納為名章印和閒章印兩大類。

（一）姓名印

此印為最常見或常用的藏書印，而且是在比較正式的場合下使用，表示個人的信

用符記。如鈐在清康熙間（1662-1735）原刊本《河工見聞錄》的「盧文弨印」，鈐在明刊本《改併五音集韻》的「翁方綱印」，由此可知藏書先後遞傳。



圖2 〈盧文弨印〉白文方印



圖3 〈翁方綱印〉白文方印

（二）別名字號印

古代對於個人的取名比較講究，除有姓有名外，還產生了與名相應的字、號，表述個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點。如鈐在南宋初期刊宋元明弘治嘉靖遞修刊本《宋書》的「徐健庵」及「劉承榦字貞一號翰怡」。



圖4 〈徐健庵〉白文方印



圖5 〈劉承榦字貞一號翰怡〉白文方印

（三）齋室名印

大凡藏書之家，都有自己的藏書齋、室、堂、閣、樓名，並刻成印章，鈐於書上。世家藏書者，又往往沿用同一室名印，如鈐在明弘治間（1488-1505）藍格鈔本《三元通天照水經》的「天一閣」朱文長方印；鈐在明萬曆丁丑（5年，1577）至戊寅（6年，1578）真賞齋刊本《自雲樓摘集》的「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均幾代人相沿不易。



圖6 〈天一閣〉朱文長方印



圖7 〈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

(四) 生平行第印

以生平行第入印是藏書印中一大特色。如《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一書鈐印有〈金吾大將軍新安伯萬登公三十世裔孫〉朱文方印，此處金吾大將軍指孫萬登，字子庸，唐青州人。曾任青州江南節度使，唐末官至金吾上將軍。而近代周大輔有印鈐蓋於《李長吉詩集》中。玄默涪灘是太歲紀年，干支即「壬申」。「月在終辜」指他出生月，「辜月」是十一月的別稱，「終辜」可以理解為十一月結束，即為十二月。「朔」為每月初一日，當年十二月初一正好是辛亥，那天下午酉時恰為「丁酉」。結合他的活動時間可確定他生於農曆1872年十二月初一下午五時至七時。生平行第印對研究藏書家的生平家世極為有用。



圖8 〈金吾大將軍新安伯萬登公三十世裔孫〉朱文方印



圖9 〈我生之年歲在玄默涪灘月在終辜辛亥朔丁酉時〉朱文方印

(五) 仕途功名印

藏書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如清代著名藏書家楊紹和。有一印曰：「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簡直就像學歷證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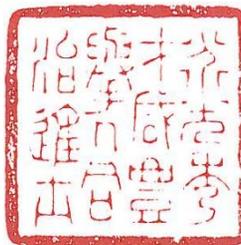


圖10 〈道光秀才，咸豐舉人，同治進士〉朱文方印

(六) 收藏鑒定印

這是藏書印中內容最豐富，也是最具史料價值的一種。最著名的是明代毛晉的橢圓形「宋本」一印，葉德輝《書林清話》云：「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元本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鈐于首。」（葉德輝，2002）毛氏以後，模仿者甚多。如汪士鐘、季振宜、吳騫等人都有橢圓形朱文「宋本」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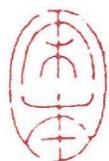


圖11 毛晉藏書印「宋本」



圖12 季振宜藏書印「宋本」



圖13 汪士鐘藏書印「宋本」



圖14 吳騫藏書印「宋本」

(七) 校讀印

一書經名家校讀後，往往會身價百倍，故精校本亦被視作難得的善本，如「公魯校讀」白文方印、「藝風審定」朱文方印、「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長方印等。



圖15「公魯校讀」白文方印 圖16「藝風審定」朱文方印 圖17「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長方印

閒章印是指用以表達其藏書觀、惜書情、旨趣欲求、處世態度等。其印文常以某某家藏、秘笈、鑒藏、珍藏、藏真、鑒賞等出現，以反映藏書家意願（熊焰，2003）。藏書家之閒印，雖不如姓名印、齋室印之常用，而是偶一鈐蓋於書冊，然其多為藏書家之志趣、心境之寫照，不可不注意。閒章印包括以下三種（蔡雲峰，2017）：

其一、箴言印，以格言、警句作為印章的內容。從不同角度表達藏書者的治學態度或者是對書籍的情感，以規勸、告誡後人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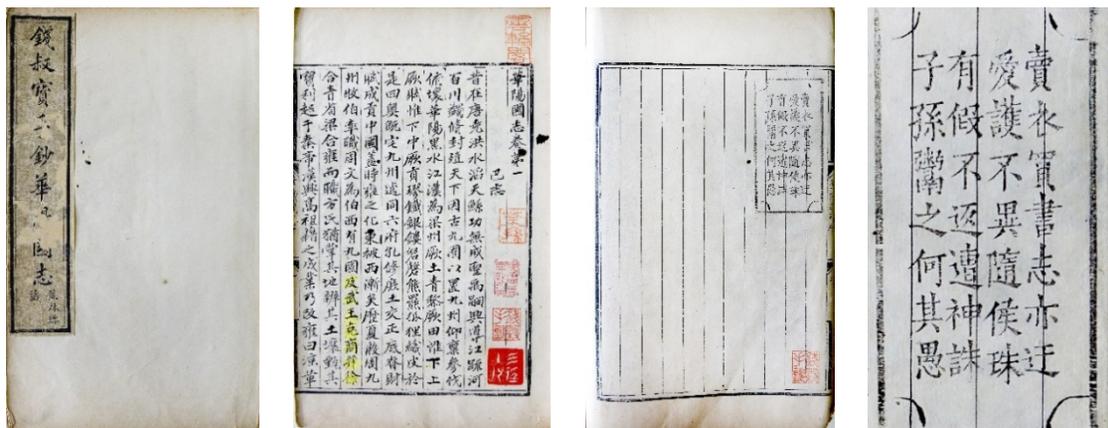
其二、鑒賞印，表示藏書者鑒賞過的。多含有「珍藏」、「曾藏」、「閱過」、「過眼」、「過目」、「經眼」、「眼福」等字眼，表達了藏書者對圖書的珍愛之情。

其三、記事印，用與藏書有關的事作為印章的內容。

古代的讀書人，愛書是天性，如果能夠得到善本佳刻，無不視為拱璧。藏書家為求善本圖書，有的不惜變賣田產，甚至還有以身殉書的事。而對於書本的愛護與態度，從藏書家的藏書印中，不難看出其端倪。

收藏印自唐有之，到後代更為普遍，藏書家得一善本，每喜在上面鈐蓋印章，以示證明，這就代表此書歸我所有。藏書印朱色燦然，若屬名家篆刻，兼具藝術價值，此外，在鑑定版本、明瞭遞藏經過諸方面，也有相當重要的功能。而印文內容，或僅記姓名字號，或表明為聖賢之後，或載籍貫、官職、書齋名等，範圍頗廣，尤以示意後代子孫善加珍惜，最讓我們感到好奇，也深覺古人迷戀善本，簡直似癡還狂。如明錢穀²藏書印刻著「有假不返遭神誅」等語句，這種詛咒借書不還者，真是太狠心了吧。

再依據館藏《華陽國志》，此書係明吳縣錢穀手鈔本，在其首冊護葉黏一舊書籤，上以墨筆書「錢叔寶手鈔華陽國志」，書名下並書「蕉林珍藏」四小字，知係清初大學士梁清標所曾藏。書中鈐有「錢穀手鈔」朱文長方印、「賣衣買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常璩，1368-1644)墨文長方印可證。



²錢穀（1508-1572），是寒士藏書中典型人物，其手抄之書，為後來藏家所重。



圖18 《華陽國志》舊書籤題書名下並書「蕉林珍藏」四小字，卷一首葉鈐有「錢穀手鈔」朱文長方印及錢穀藏書印

再就國圖所藏善本古籍來看，這一類的藏書印如清沈廷芳³藏書印「購此書甚不易，矧子孫，弗輕棄」（宋濂，1401）、清呂葆中⁴藏書印「難尋幾世好書人」（蔡沈，1280-1368）、陳群藏書印「來生恐在蠹魚中」（荀況，1368-1644），其意多為收藏書籍不易。



圖19 《宋學士續文粹》鈐有清沈廷芳「購此書甚不易，矧子孫，弗輕棄」藏書印



圖20 《書集傳》鈐有清呂葆中「難尋幾世好書人」藏書印

³沈廷芳（1692—1762），早年為國子監生，校錄《大清一統志》。官至河南按察使。建藏書樓「隱拙齋」，藏書極富。

⁴呂葆中（？—1707），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榜眼。授編修。呂留良富於藏書，父過世後，他繼承其藏書，家有藏書樓「明農草堂」、「觀稼樓」、「玉乳山房」、「吾研齋」、「只拙齋」等，藏書甚多，其中宋元刻本有數十種。



圖21 《荀子》鈐有陳群「來生恐在蠹魚中」藏書印

清張燮⁵有一藏書印，文記：「平生減產為收書，三十年來萬卷餘，寄語兒孫勤雜誦，莫令棄擲餉蟬魚」（梁辰魚，1368-1644）。其中隱喻了藏書家嗜書如命、患得患失心境。另一藏書印為「成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諸」（邵雍，1225-1279）朱文方印，堪稱收藏書籍的辛勞。



圖22 《鹿城詩集》鈐有清張燮的藏書印記

⁵張燮（1752-1808），登乾隆 58 年（1793）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歷寧紹臺兵備道，以詞章名世，有《味經書屋詩稿》12 卷。自奉儉約，喜購書，與黃丕烈友善，暇日遍遊書肆，恣覽古籍，一時有兩書淫之稱。積書至數萬卷，其藏書室曰小嫻嬛福地，孫蓉鏡能世守不墜。



圖23 《伊川擊壤集》鈐有清張燮「成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諸」藏書印記

到了後來，珍藏書章的目的，不在止於識別收藏而已，每將自己得書的經過，或告誡子孫的話，也藉著藏書章的銘文表達。譬如明代的祁承燦⁶，是萬曆年間的大藏書家，也是著名的學者，他不僅喜歡藏書，也精於校勘。他除了撰寫「藏書訓約」外，還告訴後世子孫對藏書的珍視，也期盼子孫永遠珍愛祈家的門風，並且還留下來這樣的藏書印銘：「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蔡沈，1368-1644）。又如清代的王昶⁷藏書印記，刻了一枚長達五十餘字的藏書章，銘文是：「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勤，願後人，勤講肆，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菴傳誠」（黃公紹，1368-1644）。其內容豐富極了，從聚藏不易到勗勉及告誡子孫，應有盡有。由上述諸例中，不難想見藏書的功用，已不止於識別而已，常饒富深意，帶給看書的人，不少情趣。

⁶祁承燦(1563-1628)，明萬曆 32 年進士，精於汲古，其所鈔書，世人多未見。藏書富甲江左，所收藏之所為「澹生堂」。

⁷王昶(1725-1806)，清乾隆 19 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富藏書，精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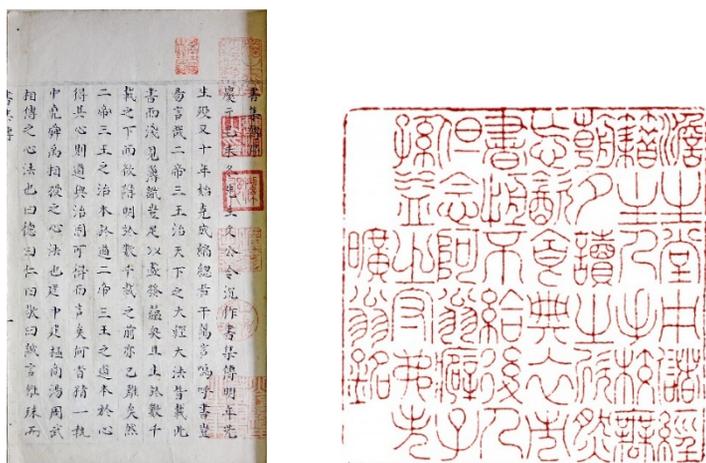


圖24 《書蔡氏傳纂疏》鈐有祁承燦藏書印



圖25 《古今韻會舉要》鈐有清代王昶藏書印記

清末刻有《榆園叢書》的許益齋⁸，有一方多字的藏書印章：「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無盡藏亦此理。但願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亦可喜」（許增，1644-1911）。其藏書印紋深含哲理，其是告誡後人好書來之不易，保藏更加困難，不要丟失圖書。其藏書觀、珍書情，更顯境界高雅。

⁸許增（1824—1903）清末學者、藏書家。字益齋，一字邁孫，浙江仁和（今杭州），喜勘訂書籍，所校刻唐文粹精核無比，性尤愛書畫，收藏既富，偶一涉筆，便自不凡，最善畫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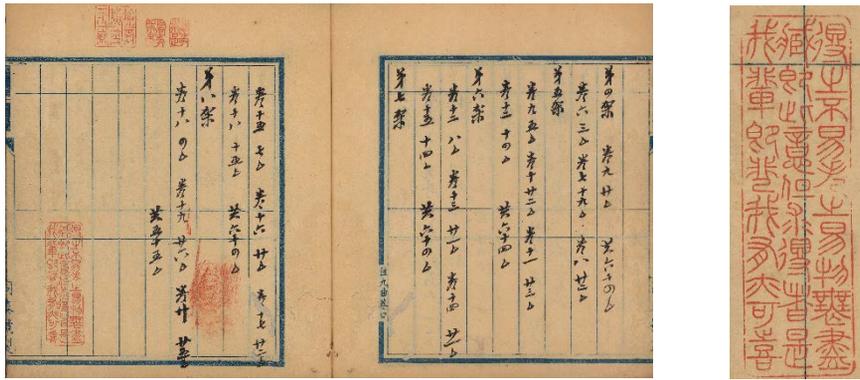


圖26 《榆園雜俎》鈐有清許益齋的藏書印章

因此，有的人就表示要「以身守之，罔敢失墜」，特別是寄希望於子孫後代。如向山閣陳鱣⁹在他最心愛的書上，都蓋上刻有自己長髯古笠的肖像印「仲魚圖象」和「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張天錫，1474）這兩方藏書印。



圖27 《草書集韻》鈐有陳鱣的肖像印和藏書印

可是，要保藏這些善本古籍，也真是談何容易，那時，除了水火兵蟲盜賊之外，最危險的還是出在自己子孫身上。如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全部藏書，陳鱣向山閣的那麼多宋刻元槧，到兒子手裡就都賣光散盡了，所以有些人的慨嘆也反映到藏書印上來：「難尋幾世好書人」！有的藏書家對借書非常謹慎，唯恐有失，如張蓉鏡¹⁰在書上鈐

⁹陳鱣（1753-1817），嘉慶三年舉人，精研文字訓詁，長于校勘輯佚，為收藏圖書、校勘圖書，他整整奮鬥了一生，計收書十餘萬卷，晚年建造了向山閣以儲之。

¹⁰張蓉鏡，清代藏書家。官候補同知，喜藏書，精於鑑別，芙川娶妻姚氏，名婉真，號芙初女史，與芙川均有藏書之好，於是名其藏書閣曰雙芙閣。曾得宋版《擊壤集》，倍加珍惜，為求永久流傳，無水火蟲蝕之災，特在書頁空白處，以血書寫「南無阿彌陀佛」6字。其藏書之所尚有味經書屋、小 孃福地。

蓋有「在處有神物護持」(邵雍, 1225-1279) 藏書印。古代, 有的人主張書要借給人看, 只希望不要損壞丟失, 吳焯¹¹就在書上鈐有「異流傳, 勿損汙」(嶽浚, 1271-1368), 這是完全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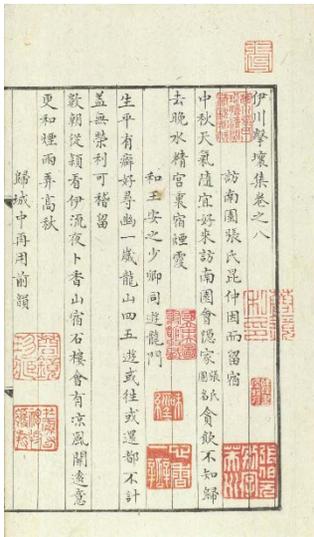


圖28 《伊川擊壤集》鈐有張蓉鏡「在處有神物護持」藏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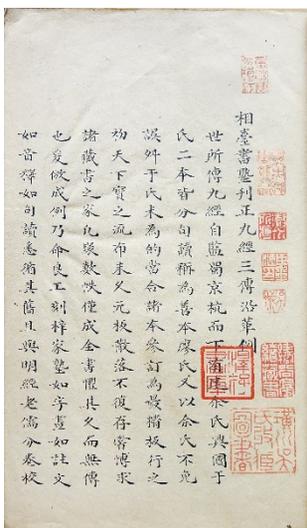


圖29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鈐有吳焯「異流傳, 勿損汙」藏書印

¹¹吳焯, 清代藏書家。生於康熙 15 年 (1676), 貢生, 官同知。好古嗜書, 凡宋雕元刻, 與舊家善本, 必百計求獲而後已。藏書不下數萬卷, 其瓶花齋藏書, 遂甲於江南。

清代藏書家顧錫麒¹²的箴言印曰：「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易失消，一殘缺，修補甚難。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憤惋浩嘆不已。數年以來，搜羅略備，卷帙頗精，伏望觀是書者，倍宜珍護，即後之藏是書者，亦當諒愚意之拳拳也。聞齋主人記」(李攀龍，1572)。娓娓說來，勝過千言萬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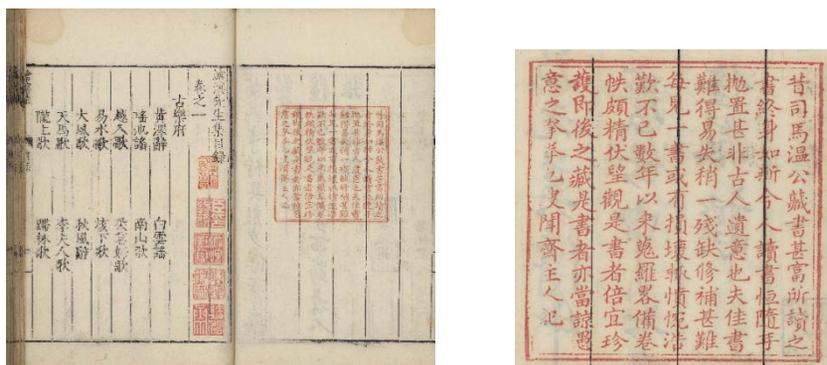


圖30 《滄溟先生集》鈐有清代藏書家顧錫麒的箴言印

在眾多的館藏善本圖書中，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許多珍貴古籍，首頁都鈐蓋「希古右文」朱文方印，末頁則鈐有「不薄今人愛古人」白文長方印，就在這兩個藏書印記後隱藏著一段搶救國家重要文獻的豐功偉業，其意義非凡。「希古右文」、「不薄今人愛古人」(姚思廉，1127-1279)既作為密記之用，也表示收書不先自設限的態度。



圖31 《陳書》鈐有「希古右文」、「不薄今人愛古人」藏書印

¹²顧錫麒，清藏書家。字竹泉，一字敦淳，別號謏聞齋主人，江蘇太倉人。仕履不詳，太平軍攻婁江，曾攜書至上海。以藏書富名於當地，藏書樓為「謏聞齋」，藏書中有宋版元刊數百種，自稱與錢曾有同好，校勘亦精。

古籍鈐印是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藏書家（出版）收藏書籍的標記。透過整理這些鈐印，有助於人們瞭解古籍的遞藏流傳歷程、版本鑒別以及藏書者的思想情感，明確古籍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歸類、輯錄古籍鈐印不僅是古籍整理的一個重要環節，更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基礎工作。

三、藏書印的學術價值

藏書印是一種人工雕琢而成、用於在書頁上鈐蓋的印章。書是藏書印的唯一載體，離開了書，藏書印便失去了區別於其他印章的獨有特色。同時，書也是藏書印與人發生聯繫的最重要紐帶，正是由於隨著書籍一起輾轉眾家，世代留傳，藏書印才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與青睞。因此，與藏書印有聯繫的人，無一不與書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而書籍作為一種物品，和人之間的關係無非是擁有與被擁有。換句話說，對於書而言，任何人的身分都只有兩種可能：是書的主人，也就是藏書人；或者不是書的主人，則可以相對應的稱作看書人。二者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經常可能相互轉化，甚至可以相互影響。所以，古代藏書家將印章用作珍玩永保的印信，矜重之情，閒逸之心均展示於方寸之間。而今人面對一枚枚鈐於書卷的朱記，在讚賞古人風流文雅、欣賞精妙篆刻藝術的同時，還應該意識到藏書印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古物遺存。

閱讀古籍，欣賞前人的藏書印，因為喜愛精美的刻印和寓有深意的文字，除了這個之外，但從學術研究觀點來說，藏書章也有很豐富的文獻價值。

（一）反映了藏書家的生活與感受

藏書印章對探究家庭的活動與思想頗有益處外，反映了藏書家的生活與感受，表達一種淡泊名利、逍遙自在、與世無爭思想，修身養性的準則。

（二）了解藏書家的個人資料

藏書印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鑑賞價值，尚可從中了解藏書家的個人基本資料，諸如生辰、名號、行第、籍貫、仕途、功名、肖行、志趣、讀書處、藏書齋等，從而為鑑定書籍及版本提供了線索和依據，也間接了解時下藏書家們的藏書觀。

(三) 從藏書印瞭解每一本書的遞藏經過

藏書印的鈐蓋是有一定規律的。一書若是經過多人所藏，通常是最先藏書者鈐印於首卷卷端最下方，後藏者則依次往上鈐蓋，以至於天頭、欄外。據此便可知曉這一圖書的遞藏、流傳過程。然而藏書家用不同的印記見證自己的收藏，因此，愈是精槧古書，其纍纍藏書印不僅是迭經珍藏的身份證明，亦可藉以考知典籍流傳的軌跡，更能察及經歷歲月的長久。如：翁方綱「寶蘇齋」所藏南宋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刊本《註東坡先生詩》，除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外，尚有「大明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白文方印（安國）、「汲古閣」朱文方印（毛晉）、「商丘宋犖收藏善本」朱文長方印（宋犖）、「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印（揆敘）、「覃溪珍賞」白文方印、「寶蘇室」白文方印、「蘇齋」朱文長方印（翁方綱）、「小西涯居士」白文方印（法式善）、「筠清館印」朱文方印、「南海吳榮光書畫之印」朱文方印（吳榮光）、「小蓬萊閣」朱文方印（黃易）、「志詵」白文長方印、「葉志詵」朱白文方印（葉志詵）、「張埴審定」白文方印（張埴）、「董洵」白文方印、「小池」白文方印（董洵）、「藏之海山仙館」朱文方印、「子韶審定」朱文方印、「潘氏德隅珍賞」白文方印（潘仕成）、「吳興張氏圖書之記」朱文長方印（張澤珩）、「剛伐邑齋」朱文方印（袁榮法）、「袁思亮」白文方印、「伯夔」朱文方印（袁思亮）、「韞輝齋」白文方印、「蔥玉」朱文方印、「張珩私印」白文方印（張珩）等藏書章（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9）。諸多的藏書章，可徵知此書收藏始末，最先藏有此書的是明朝嘉靖年間無錫的安國，其後歷經毛晉、宋犖、揆敘、翁方綱、法式善、吳榮光、黃易、葉志詵、張埴、董洵、潘仕成、張澤珩、袁榮法、袁思亮、張珩等人，也成為鑑賞古書的風景之一。



圖32 南宋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刊本《註東坡先生詩》

這部珍貴古籍的價值在其宋註中保留許多宋代史料，解讀了東坡意在言外的深義；宋刊宋印則展現其歐體宋版書端楷明淨的特色；翁氏寶蘇齋的年年祭書，加上歷代遞藏印記、觀款、題跋，賦予此書另一層的藝術價值；而浴火重生的焦尾本，更增添其傳奇性。此珍籍背後蘊涵的故事，篇篇動人而精采，古代文人對書籍的珍視分享、應對酬作的生活美學與逸趣，亦躍然典籍之上。

又如一部宋代所刊印《尚書表註》，書中鈐有「南樓書籍」朱文方印、「天水」朱文葫蘆形印、「董印其昌」朱白文方印、「古杭瑞南高士深藏書記」朱文長方印、「騫」朱文長方印、「擇是居」朱文橢圓印、「吳城」朱文方印、「敦」「復」朱文連珠方印、「汪士鐘曾讀」朱文長方印、「廣伯」白文長方印、「張印鈞衡」白文方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石銘收藏」朱文方印、「蕙圃收藏」朱文長方印、「願流傳勿污損」朱文長方印、「內樂村農」朱文方印、「青蘿」朱文長方印、「周春」朱文方印、「周春」白文方印、「松靄」朱文方印、「松靄」白文方印、「松靄藏書」朱文方印、「泰谷周春」朱白文方印、「周春字芑兮號松靄」白文方印、「周字芑兮印」白文方印（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6），則可知這部書歷經明董其昌舊藏，入清經顧湄、吳氏繡谷亭、丁氏持靜齋、馬思贊、周春、張金吾、汪士鐘、張鈞衡適園、張乃熊蕙圃諸家遞藏，後由國圖滬購入藏，為傳世僅存之孤本。



圖33 南宋末年建安刊本《尚書表註》

此外，還有好多印文相同的藏書印，單靠文字說明，不看原印，往往不能最終確定，故熟識各藏書印，對研究我國藏書史無疑有極大幫助。從昔到今，這些累累藏書印章，記錄了對千萬卷圖籍精華護持授受的經過。一印一書緣，隱約也可察覺出傳統文化的脈動。

(四) 依據藏書印及書齋，得知藏書家收藏的特色

藏書家的藏書處所名入印，古制原無，始於唐宋，用以書畫(吳芹芳、謝泉，2005)。藏書家都有自己的藏書齋、室、堂、閣、樓台，並鑄成印章，鈐於書上。如黃丕烈的「百宋一廬」，知其藏有百部宋版書；陸心源的「皕宋樓」，知其藏有兩百部宋版書，雖然其中不乏明人所偽刻的，但也大致可看出其特色；瞿鏞的書齋為「鐵琴銅劍樓」，足見他的收藏，除了書籍外，也收藏不少金石。清代光緒年間的丁丙，他有一書樓為「善本書室」，他所謂「善本書」的標準是：第一種是「舊刻」，指的是宋元刊本；第二種是「精本」，指的是明初到嘉靖年間雕刻精工的本子；第三種是「舊鈔」，指的是影鈔宋元精本而筆墨精妙的本子；第四種是「舊校」，指的是名家校讎精審的本子(丁丙，2002)。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前人對「善本書」所訂的範圍和標準，可以說是很有貢獻的藏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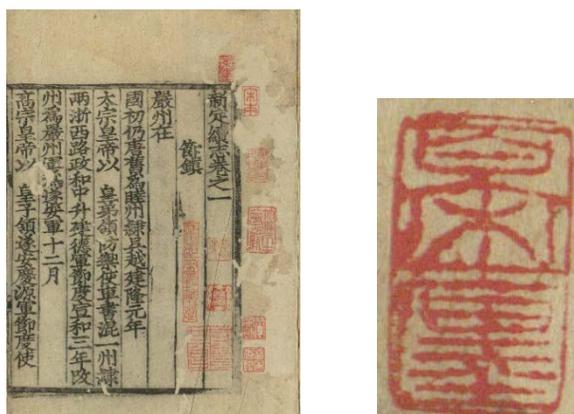


圖34 《新定續志》所鈐印黃丕烈「百宋一廬」藏書印



圖35 《開元天寶遺事》所鈐印陸心源「吳興陸氏皕宋樓珍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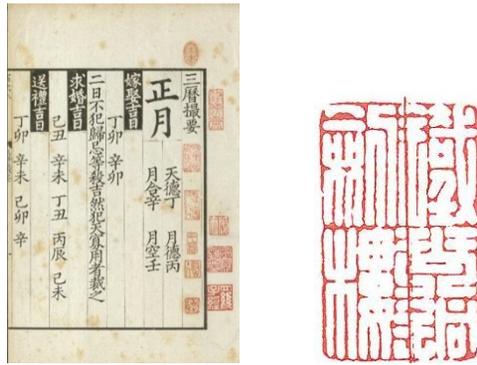


圖36 《三曆撮要》所鈐印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印

(五) 揭示了古籍印記蘊含的史料價值

史料價值就是歷史材料（一般地說，以文字材料為主，也包括實物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價值。小藏書鈐印，字數不多，但方寸之間卻凝聚了十分豐富的資訊資源。藏書鈐印一般包括藏主的姓氏字型大小、生平行第、鄉里籍貫、官職履歷、書齋雅號、鑒賞品記、志趣愛好、警語箴言等，從中既可以看出各藏書家的癖好志趣，更有助於判斷一書的收藏和流傳（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8）。透過藏書鈐印，可以考查藏書家的姓名、別號、藏書樓乃至籍貫、官職裡居、年齡甚至形跡、交往，窺見藏書家的個人修養、處世態度及藏書觀念，是研究我國歷史文獻發展變化的重要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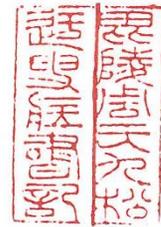
翁方綱印



蘇齋



季振宜藏書



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



朱彝尊印



吳郡顧元慶氏珍藏印



東郡楊氏海源閣藏



董氏玄宰



遂圃收藏

圖 37 琳琅滿目的收藏印章紀錄了對千萬卷圖籍護持授受的經過

(六) 藏書印還能為古籍版本鑑定提供較可靠的依據

古籍版本鑑定是一項複雜的綜合性的知識判斷，主要是根據原書的內容、序跋、字體、紙張、刻工、裝幀等，而作為書籍流傳過程中附加上去的藏書印，對於版本的鑑定也起到輔助作用。大多數藏書家對於宋元善本都有專門的收藏印，如明毛晉「甲」（周南瑞，1368-1644）、「元本」（魏徵，1297-1307），王世貞¹³「伯雅」（趙善璿，960-1279）。楊以增¹⁴「宋存書室」（陳騏，1351）及丁丙的「善本書室」（王引之，1796-1820），乃至乾隆的「天祿琳琅」（陶潛，1127-1279）等。另外，還可以依據藏書印，尋其藏主的藏書目錄，以便了解該書版本原委，如有錢謙益書印的可以查《絳雲樓書目》。因此，藏書印具有識別和標識的作用，被認為是鑒別版本的重要依據之一。

¹³王世貞（1526-1590），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嗜書成癖，所藏宋刻多前有「貞元」印，又有「伯雅」、「仲雅」、「季雅」分印各本，以別甲乙，論者以為較之毛晉區別更為詳晰。

¹⁴楊以增（1787-1856），清道光二年（1822），官至江南河道總督。他收藏既富，乃別辟「宋存書室」貯天水舊籍，而以元本、校本、影宋鈔本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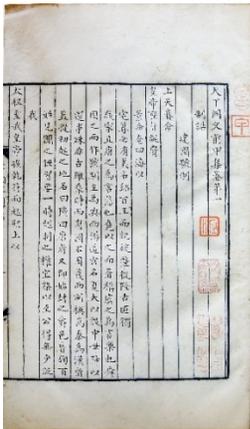


圖38《天下同文前甲集》鈐有毛晉「甲」藏書印 圖39《隋書》鈐有毛晉「元本」的藏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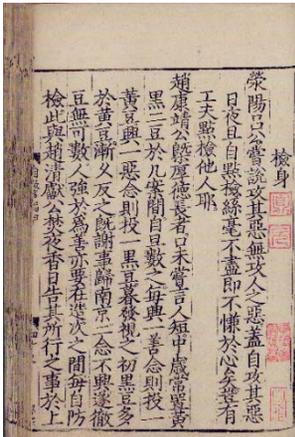


圖40《自警編》鈐有王世貞「伯雅」藏書印圖 41《文則》鈐有楊以增「宋存書室」藏書印



圖42《尚書訓詁》鈐有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印 《箋註陶淵明集》鈐有乾隆的「天祿琳琅」藏書印

(七) 依據收藏者推斷大體版刻年代

一般透過藏書印就能確定收藏者。收藏者可能是宮廷、可能是書院、可能是個人，但不論是誰，只有成書後才能在上面鈐印，故依據收藏者的印章可推斷一下大體版刻年代。例如，一書若鈐有「翰林國史院」長方形朱印（權德輿，1127-1279），此書版刻就不會晚於元代，因為翰林國史院是元代公藏之地。南宋緝熙殿藏書印。如果一書有多人藏印，要找出最早的藏印來確定大體時間。如書中鈐有「晉府書畫之印」朱文方印（韓道昭，1212），可推斷此書不晚於明初。「晉府書畫之印」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個兒子晉王朱櫚的藏書印，朱櫚死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趙頤光雖是明朝人，但時間晚於朱櫚。以藏書印推斷版刻年代的前提必須印記是真的，如果是偽印，那就不足為憑了。



圖43 《權載之文集》鈐有「翰林國史院」藏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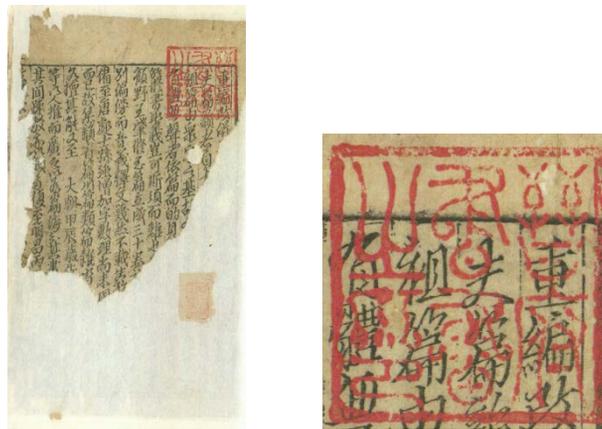


圖44 《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鈐有「晉府書畫之印」藏書印

（八）教育功能

許多藏書印從不同的角度表達藏書家的治學態度或讀書、藏書的方法及愛書、惜書之情，諄囑子孫後人保存好藏書。誠如許增的「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無盡藏亦此理。但願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亦可喜」印，還有「子孫永寶」、「得者寶之」等印。其言近旨遠，意蘊深刻，耐人尋味，無不表達了愛書之篤，讀書之樂，寄子之望。其藏書觀、惜書情，實屬可貴，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

（九）藏書印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極高的藝術價值

印章是中國優秀傳統藝術之一，它和中國的書法、繪畫、雕刻等一樣，具獨特的藝術風格。藏書印的印文，有秦篆、繆篆、鐘鼎文字、漢隸、楷書等不同形式的刻法，顏色多種，雕刻精美，印泥講究，有的歷經數百年，依然清晰醒目，為閱讀者留下了充分欣賞、想像的空間，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價值。

自來藏書印記，多請名手篆刻，故其藝術價值，不下書畫家印記一等。如明代毛晉用印，多出汪吳之手；清代潘祖蔭滂喜齋藏章，乃趙之謙手治；徐乾學「傳是樓」一印，實為顧苓之作；朱彝尊「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一印，葛潛為之；繆荃孫常用之「荃孫」一印，則黃牧甫手耕；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其他如鮑廷博、法式善、陸心源等人用印，或凝重古樸，或溫雅秀逸，均可稱精美之極，其形制，其款式，其篆法，亦足為今日藏書印之典範。

藏書印是詩、書、畫、印的一種完美結合。人們常以「方寸」一詞來形容，儘管鑑藏印的藝術表現空間十分狹隘，但它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文化意蘊，呈現多元的藝術魅力。

四、結語

古代私家藏書印鑒作為一枝瑰麗的奇葩，不僅是藏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留給我們後人的一分珍貴遺產，這一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無疑我們應當繼承發揚。我國許多藏書家如徐乃昌、董康、鄧邦述、陶湘、劉世衍、蔣汝藻、劉承幹、吳梅、袁克文、周叔張等，都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古代私家藏書印鑒的種類在古籍中都能有跡可尋，而且于藏印之重視、講究絲毫不亞于古人，甚而有或過之。

國圖善本古籍中的藏書印章具學術性、資料性、藝術性三美兼備的特性。藏書印反映著讀書人的生活情趣，精神追求，思想境界，甚至讀書治學體會。藏書印在措詞上往往多樣而有變化，林林總總，別出心裁，加上印章精美考究，不但給後人留下溯宗考源的線索，也可為書籍增輝。

國圖目前正在有計劃地整理館藏善本古籍的藏書印，並建立資料庫，提供研究者使用。建立善本古籍藏書印系統，實有以下功效。首先，藏書印的建立可對古籍文獻起到保護作用。古籍文獻上的藏書印資源透過技術手法經數位儲存後，可以減少使用者使用原件的頻率，避免或減少原件損壞和丟失的機率。此外，對古籍文獻上的藏書印資源進行數位化整理過程，本身也是對古籍文獻起到一定的修復作用，解決古籍紙張老化或古籍文獻變質的保護問題。

其次，藏書印資料庫的投入使用可提高藏書印資源利用率。眾所周知，藏書印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而，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這一價值始終未被充分挖掘。究其原因，在於藏書印的辨識難度太大。尤其是非文字學專業背景、不懂篆刻的研究人員在辨識藏書印時十分棘手。如今有可供檢索的藏書印資料庫，除了能夠縮短研究者查找、辨識印文的時間外，還能透過印文、印主等檢索項查找到同一印主的多部藏書，明確書籍資料的流轉變遷過程，對散逸的藏書群進行考證、再編等。如此一來，藏書印資源的利用率及利用效率將會大大提高。

最後，有利於學術資源的共建共享。藏書印資源數位化後，既有利於科學化管理和維護，又為開展特色服務創造條件，還可以在資源的共建共享上發揮作用，促進整個社會對資訊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在藏書印數位化過程中，解決印文及印主的辨識問題是一個長期、複雜的工作，也是一個需要集思廣益的工作。基於館藏的藏書印資料庫開發，既是文獻資源長期保存的必要手法，又是書籍流傳史視覺化開發的有效嘗試，同時也有益於學術資源的共建共享。資料庫開放後，使用者利用互動平臺，對印文進行評價、糾錯、補充、更正等。在滿足讀者共用資源的需求的同時，也促進資源的共建開發。筆者認為，圖書館對大眾進行藏書印知識普及和藏書印資料庫的宣傳推廣是十分必要的。而推廣方式除了在館內開展藏書印主題展示活動以外，還可以借助網路平臺等。另外，資料庫建成後，圖書館透過宣傳推廣在短期內能夠提升讀者量，但要想擁有穩定上升的使用者，主要還是依賴資料庫自身的質量，即它的實用性、資源量、可操作性、後期更新頻率等。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國的藏書印資源整理建立尤其是藏書印資料庫的建立任重道

遠。

總之，藏書印是藏書家愛書的產物，是藏書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枚小小的藏書印章，折射出的卻是一個大千世界。方寸之地的藏書印，不僅是藏書家們的個人標記，也是他們的精神寄託，同時其深刻的文化意蘊也為今之學人帶來藝術上的享受，更是可從中探索明清藏書家藏書思想，古籍文獻的繼承流傳，藏書事業的發展與變化的重要依據。藏書印反映了藏書家搜集、保管、流通圖書的經過與體會。古今藏書，在書上施以印章，勾勒了一部書的流傳軌跡，印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號、鄉里、祖籍、藏書處所、官職、鑒別、授受、告誡、記事、言志等內容，是我們鑑定一書的價值，特別是其文物價值的最佳依據。這對於後人了解文獻的收藏和流傳以及鑒別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探析藏書印有利於古籍及藏書印諸方面的研究和利用，具有現實意義，也是啟迪今人追求知識的精神食糧。

參考文獻

- (清)丁丙(2002)。善本書室藏書志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927)。
- (清)王引之(1796-1820)。尚書訓詁，清嘉慶間鈔本。
- 王珮琳(2014)。中國古代藏書印小史。北京市：中國長安出版社。
- (元)王廣謀(1271-1368)。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元刊本。
- 吳芹芳、謝泉(2005)。中國古代的藏書印。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 呂允在(2017)。明清藏書印中的文人意象。書畫藝術學刊，23，55-79。
- (明)宋濂(1401)。宋學士續文粹，明建文辛巳(三年，1401)蒲陽鄭氏義門書塾刊。
- 李杰、李楠(2015)。中國古代藏書。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
- 李欣宇(2011)。煌煌古籍累累朱迹—古籍善本上的藏書印。書林，220，79-84。
- (唐)李賀(1119-1130)。李賀歌詩編，北宋末南宋初間(1119-1130)公牘紙印本。
- (明)李攀龍(1572)。滄溟先生集，明隆慶壬申(6年，1572)吳郡王世貞刊本。
- (晉)杜預(1368-1644)。春秋左傳註疏，明李元陽刊十三經註疏本。
- (元)周南瑞(1368-1644)。天下同文前甲集，明常熟毛氏汲古閣影鈔元大德刊本。
- 林申清(1989)。明清藏書家印鑑。上海：上海書店。
- 林申清(1997)。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林申清(2000)。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宋)邵雍(1127-1279)。《伊川擊壤集》，南宋末期刊本配補明初仿宋刊及鈔本。
- (唐)姚思廉(1127-1279)。《陳書》，南宋初期刊宋元明嘉靖遞修本。
- 封思毅(1989-1992)。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今昔。《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40-52。
- (宋)洪邁(960-1279)。《史記法語》，舊鈔本。
- (宋)范仲淹(1334)。《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元元統二年(1334)范氏歲寒堂刊本。
- (明)徐一夔(1530)。《大明集禮》，明嘉靖九年(1530)內府刊本。
- 徐昕(1995)。從藏書印看明清藏書家的藏書觀。《山東圖書館季刊》，4，58-61。
- (周)荀況(1368-1644)。《荀子》，明樊川別業刊本。
- 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館史史料選輯—古籍搜購與集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6(1)，73-100。
- 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8)。《善本藏書印章選粹》。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2014)。《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6)。《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9)。《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0)。《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
- (晉)常璩(1368-1644)。《華陽國志》，明吳縣錢穀手鈔本。
- (金)張天錫(1474)。《草書集韻》，明成化十年(1474)蜀藩刊本。
- (元)曹本(1644-1735)。《續復古編》，清初鈔本。
- (明)梁辰魚(1368-1644)。《鹿城詩集》，明鈔本。
- 梁戰、郭群一(1991)。《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周)莊周(1605)。《莊子郭註》，明萬曆乙巳(三十三年，1605)鄒之嶧等校刊本。
- (清)許增(1644-1911)。《榆園雜俎》，手稿本。
- (南北朝)陶潛(1127-1279)。《箋註陶淵明集》，南宋末年建刊巾箱本。
- (元)黃公紹(1368-1644)。《古今韻會舉要》，明覆元刊本。
- (清)葉德輝(1978)。《藏書十約》，臺北市：成文。
- 葉德輝(2002)。《書林清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詹友諒(1324)。《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元泰定元年(1324)麻沙吳氏友于堂刊配補明刊本。
- 熊焰(2003)。試論藏書印的源流、類型及功能。《東南文化》，8，36-39。
- (宋)趙善瑋(960-1279)。自警編，宋刊本宋·陳騏(1351)。文則，元至正11年(1351)劉

貞金陵刊本。

劉兆祐（1983，5月17日）。鈐章纍纍溢書香—藏書家印記談趣。《聯合報》，8版。

劉兆祐（1987）。藏書章的故事。《國文天地》，2(10)，52-55。

劉兆祐（2007）。《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市：臺灣學生。

（唐）歐陽詢（1527）。《藝文類聚》，明覆刻嘉靖丁亥（六年，1527）長洲陸采刊本。

（宋）蔡沈（1271-1368）。《書集傳》，元建陽刊初印本。

（宋）蔡沈（1368-1644）。《書蔡氏傳纂疏》，明山陰祁氏澹生堂傳鈔元泰定間梅溪書院刊本。

蔡雲峰（2017）。古籍鈐印的類型與意蘊。《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38(1)，71-73

（宋）黎靖德（1473）。《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1473）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六年（1270）導江黎氏本。

盧錦堂（1996）。藏書章·善本情。《國文天地》，11(8)，94-97。

霍曼麗（2004）。藏書印的內容及價值。《圖書與情報》，2004.02，22-24。

（元）嶽浚（1271-1368）。《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舊鈔本。

（金）韓道昭（1212）。《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金崇慶間刊元代修補本。

（唐）魏徵（1297-1307）。《隋書》，元大德間（1297-1307）饒州路儒學刊明印本。

藺德生、趙萍（2005）。《古今圖書收藏指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宋）蘇軾（1165-1189）。《東坡先生奏議》，宋乾道淳熙間（1165-1189）刊本。

蘇精（1979）。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09-114。

蘇精（1981）。藏書之鄉·藏書之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4(1)，25-33。

蘇精（2009）。《近代藏書三十家》。北京：中華書局。

（唐）權德輿（1127-1279）。《權載之文集》，南宋蜀刊本。

